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

□洪银兴 □杨玉珍

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已经形成,但实践中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国民经济转向内循环为主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本文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分工理论,提出转向新发展格局的三大路径。一是需求侧的推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在突出消费环节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指出分配和流通环节对消费需求具有支撑和市场实现作用,从而构成内需体系。二是供给侧的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要深度融合,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三是外循环转向,实施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战略,重组产业链国际布局。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双循环;路径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1)03—0005—10

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1.03.001

引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是综合研判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后做出的战略部署,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对策,服务和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转向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当下中国经济学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意义^[1]。

回顾我国发展格局的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主要是国民经济的内循环。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也就启动了国民经济的外循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国际循环。其主要特征有三点: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化,在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的同时,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也进入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参与到了国际产业内的分工。我国在参与国际循环中分享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的开放型经济遇到巨大冲击。尤其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重挫世界经济,2020年除中国经济实现2.3%的增长外,其他重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在此背景下,我国所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国际条件已不完全具备,调整发展格局势在必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2)

作者简介: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玉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而另一方面,持续强劲增长的国内需求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自此以后我国特别重视扩大内需,内需市场迅速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牵引力。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正是宏大的市场依托。内需潜力巨大,国内大循环活力显现。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之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浪潮等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遵循原则和重点部署。

目前,如果按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计算,2019年我国经济的外向度为32%,连同服务进出口总额外向度也才37%。这表明我国整体上还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是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沿海地区则是以外循环为主体,如2019年按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的外向度,上海达89%,广东达66%,浙江达49%,江苏达44%。由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内在的要素禀赋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动能不足,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明显乏力。沿海地区把资源和市场都放在国外,没能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2]。

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理念已经形成,但在实践中这种新发展格局需要构建,或者说需要一个向新发展格局转变的过程。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提出转向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国民经济循环既在国内又可能进入国外,由此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指的是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都在国内,外循环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消费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涉及进口和出口;二是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在国外,形成产业链的外循环。转向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调整进出口战略,还需要将外循环的卡脖子环节转向国内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国民经济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这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需求侧重在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发挥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供给侧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上,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外循环则重在推进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

一、需求侧: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超大规模的内需是大国国民经济顺畅内循环的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以亚当·斯密经济学贡献说明内需对一国经济繁荣的意义:“斯密揭示了在通常情况下,放开对贸易的限制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为一国创造经济繁荣。”^[3]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一大国内社会零售品消费大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我国国内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大、范围广且需求层次多样,我国家庭消费支出在2008—2018年间保持着9.92%的增速,分别高出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6.65、4.8和8.26个百分点。我国国内市场的超大规模性和消费市场的多层级性特征是我国建立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条件。经济超大规模性包括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超大规模的国土空间和超规模的统一市场,有利于实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有利于空间集聚、区域间的创新溢出和学习效应外溢。而多层级消费市场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或相同区域的要素禀赋或产品偏好不同,进而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导致中国存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消费者,产生了多元化的消费结构。市场规模大、消费层次多又为中国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创造了商品的价格及非价格竞争优势,有利于利用国内和国外

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需要指出,国内市场大、内需潜力大只是潜在的发展要素,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扩大内需的努力,需要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完善扩大内需的支撑和保障体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一)突出消费环节的基础性作用

消费率的高低实际上反映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过去相当长时期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以高积累来谋求高速度。积累率(储蓄率)居世界前列,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低水准,直至2011年消费率还只有34.4%。实践证明依靠高积累低消费谋求的高速度,不以满足消费为目标,而是为生产而生产,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不高,适应的是短缺经济背景下的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根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需求,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由追求高积累到明确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反映发展理念及相应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主要说明是:

首先,进入新时代以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2013—2018年6年间消费的贡献率分别为50%、51.2%、66.4%、71%、58.8%、76.2%。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回落至57.8%,仍然明显高于投资和出口需求的贡献率。出口对GDP的贡献率2014年到2019年分别为4.3%、-1.3%、-9.6%、8.6%、-8.6%、11.0%。不仅处于低位,而且大起大落波动很大。消费发挥了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功能,消费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

其次,根据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环节的分析,生产、消费分别既是起点,也是终点,相应的国民经济循环就有正向循环和反向循环两个链条。正向循环是以生产为起点、消费为终点、期间经过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循环;反向循环则是以消费为起点、生产为终点、期间经过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循环。正向循环和反向循环形成完整的、闭合的、正负反馈的循环链,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正向循环是基础,生产决定消费,生产方式决定和影响物质生活的核心。对于快速增长型经济体而言,其供给能力较强,因此以消费为起点的顺畅的反向循环就特别重要。一方面,最终消费需求对供给有显著的牵引作用。就如马克思分析的,在再生产中,消费提供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将直接带动生产水平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达到高位水平,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已有的发展格局中有相当的生产能力是靠国际市场需求消化的,现在这些国外需求需要由扩大的国内消费需求来替代。

内需包括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涉及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投资率(积累率)和消费率。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践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来拉动。消费率常年占国民收入30%以下。改革开放以后消费率逐年提高,2011—2019年我国消费率平均为53.4%,202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11.2个百分点,但是横向比较仍较低,发达国家同期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0—80%,全球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8%。这说明我国消费率的提高还有较大的空间,尤其是转向新发展格局,基于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其他需求。消费率的进一步提高是必然的,以下根据新发展格局要求研究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

首先,转向新发展格局需要推进消费升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至2019年我国恩格尔系数

从30.6%下降到28.2%。这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食品之类的基本生活消费品需求在新增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反过来就是消费升级。消费升级的方向,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居民对满足发展和享受需要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明显增长。以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健康、绿色、安全等领域转型,形成消费新模式,培育消费新业态。消费升级可以促进更优质、更广泛的消费品供给,为居民部门提供样式更多、质量更高的消费品选择。尤其是文化教育和信息消费成为热点。消费结构的这种转型必然牵动供给结构转型。转向新发展格局意味着需要对消费升级的方向给予支持和引导。

其次,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公共消费一般是政府财政承担的,用于行政管理、科学、国防、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卫生保健、城乡公用事业及各种生活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我国公共消费的比重在计划经济时期比较高。市场化改革推进后,许多公共消费部分退出,转向通过市场的私人消费,有些地方过度市场化,把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都卖掉,因此中国公共消费比重在下降,在最终消费中公共消费占比在2000—2005年期间徘徊在26%—27%之间。2019年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6.6%。从国际比较来看,该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7.1%,说明我国的公共消费比重还有上升空间。现在我国实现了全面小康,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不仅如此,公共消费中用于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费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用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消费的比重会逐渐增加。扩大公共消费需要明确教育、卫生、医疗的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私人进入这些领域只是补充而不是替代。而且,扩大公共消费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消费量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仅要体现谁享受谁付费的横向公平,还要体现纵向公平,使低收入者也能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意味着转向新发展格局,需要在公共消费领域提高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提升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达到释放居民消费需求能力的目标。

以上提高消费率的安排,同时也会拉动和引导投资需求。满足居民的消费升级及公共消费的需要会牵引相应的投资需求。转向新发展格局就包括投资方向适应消费需求增长的调整。从这一意义上说提高消费率并不挤出投资需求,而是给投资需求提供方向,创造新空间。

强调以消费为起点的国民经济的反向循环,突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绝不意味着只是最终消费影响国民经济循环,最终消费从哪里来,消费力是如何提高的?这些要靠再生产的其他环节的作用,在再生产的环节中,最终消费的形成依赖于生产、分配和流通环节的作用。

(二)分配环节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撑作用

在社会再生产中分配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重要媒介,扩大消费需求离不开分配的作用。研究分配和消费的关系,特别要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消费力”的概念,消费力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消费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消费力与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禁欲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4]消费力的提高,消费的扩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影响消费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的收入分配关系,即微观分配关系;二是国民收入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即宏观分配关系。现阶段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转向新发展格局需要通过分配关系的调整来提高居民消费力,从而扩大消费。其主要路径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是最高的,就是说,低收入群体对收

入变动消费倾向最为强烈。我国即将完成的脱贫攻坚任务消灭的是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低收入人群中的大部分是农民,还有城市中的失业者。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是增强社会消费力的重要方面。其路径首先是稳就业。就业是基本的民生,需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的政策,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其次是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切实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建立健全促进工资合理、稳步增长的机制。另一方面完善要素报酬,建立土地、资本、数据、技术等要素依据使用权、收益权获取报酬的市场化机制,使劳动者也能获得这些非劳动要素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按收入层次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群体,我国目前是低收入者占多数的金字塔型结构。与新发格局相适应的结构是,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员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里,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对扩大消费需求来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相对较强,是中高端消费的主力,是消费升级的领头羊,是产业升级的推动者。我们所讲的中国市场大,不只是指14亿人口的市场,更是4亿多中等收入者的市场。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政策目标。从实践看,中等收入群体基本上是靠要素报酬获取收入的。资本收入、技术收入、管理收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

第三,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现阶段的再分配机制主要有社保、税收、转移支付等。这些再分配机制的运行以精准调节为目标,达到控制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的目的。对扩大消费需求最为重要的是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者具有克服消费的后顾之忧作用,也是社会稳定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随着城市中取消企业劳动保障,农村中农民失去土地保险,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替代,包括基本住房、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主要涉及几个方面:首先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其次坚持公平原则,再次实现城乡、异地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同时发挥好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环境。

(三)流通环节对扩大消费的市场实现作用

马克思指出,流通领域是商品生产者关系的总和,涉及市场关系。最终消费是在市场上实现的,自给自足的消费只是在家庭范围,形不成国民经济的循环。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消费离不开市场,涉及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即在市场上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转向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很大程度上是指畅通市场流通。

就消费需求来说,消费只有同流通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需求。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媒介,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完善的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供求的协调,市场价格自动调节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适配性,也就是结清市场供求。这正是国民经济顺畅循环所需要的调节机制。对于居民的消费力来说,对其消费支付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有收入分配因素,还有流通领域的市场价格因素。

消费需求实际上指的是市场需求,市场到哪里,那里的潜在消费需求就会成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市场的影响还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市场的创新和扩大会创造和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所需要的最终消费需求的的增长,离不开市场有效作用。基于流通与消费的关系,尤其是市场对扩大消费需求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着力进行市场建设。

首先,建设现代标准的市场体系,克服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堵点,畅通市场流通。其中包括适应消费需求的层次性发展多层次市场,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和物流体系,特别要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提高农民的

消费力。其次,发展消费金融。根据马克思的市场理论,货币作为流通媒介后,买卖时间空间不一致,这时候信用介入就可以畅通流通,推行消费信用,就能克服短期内消费能力的不足,进而达到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当然需要防止可能潜伏的债务风险,尤其重视消费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发展流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流通模式,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线上流通,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促进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发展。降低企业流通成本。这里特别指出发展服务经济对畅通流通渠道的作用。许多产品消费需要以服务消费为媒介。服务经济与消费经济互动发展。新型消费业态的拓展也是由服务业引导的。哪里的消费需求旺,服务点及网络就到那里去。哪里的服务业发达,那里的消费需求就旺盛。

第四,规范的市场秩序。这是上述各项旨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建设的保障。扩大消费影响最大的有两个秩序问题: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直接挫伤消费热情;二是市场价格水准直接影响支付的支付能力。因此强化并优化市场监管机制,规范市场价格形成,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可以使人们在良好的消费预期中扩大消费需求。

以上分析表明,内需体系不只是消费环节,而是包括分配、流通、消费在内的系统。相应地,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以最终消费为中心,分配和流通环节与之相协同并且相互畅通。至于生产环节,属于供给侧。

二、供给侧: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仅涉及由最终消费需求带动的循环,还包括从供给出发的产业链循环。供给侧转向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5]。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打通产业链环节的堵点,把产业链国外循环受阻的环节转向国内。

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之时,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时,正逢经济全球化浪潮。当时的国际分工进入了产品内分工阶段。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全球布局,是要吸纳和整合全球最优资源和市场,尤其是技术供给。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参与这种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也就参与了产业链的外循环。我国参与产业链的外循环主要有两个方向,一种是以我为主的产业链进入外循环,依托的是以我为主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在外循环中利用具有高端技术的零部件配套,利用国际市场^[6]。另一种是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嵌入以国外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基本上处于其中低端环节。应该说,我国在参与这两个方向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获得了全球化红利,产业基础得到了提升。

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直接影响是我国产业链的外循环遇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低迷,受全球贸易局势恶化、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多重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额显著下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政策盛行。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企图与中国在科技、产业等领域脱钩,导致我国多条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中高科技的国外环节受到打压和断供。与此同时,因为疫情和经济衰退等原因全球产业链的国外市场出现萎缩。另一方面,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逐渐消失,而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劳动力更为廉价,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方向。进入我国的全球产业链面临发达国家上游企业向本国回流、中下游企业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分流的双重压力,我国产业和企业嵌入的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的压力。^①在

^①2020年4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建议,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回流支出政府买单,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日本政府推出108万亿日元经济救助计划,其中2200亿日元支持日本企业从中国撤回日本。

此背景下,我国产业链环节的布局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许多产业链环节需要转向国内。这样,产业链循环转向内循环成为国民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重要方面。实现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加快国内产业升级,在国内供给端围绕创新链形成完备的产业链条,形成本土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的良性循环。这就提出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一)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链循环的畅通既涉及需求又涉及供给,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存在前向和后向的需求问题,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存在供给问题,尤其是技术供给。产业链转向内循环的主要方面是国外断链的环节在国内找到替代,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自主,要求在设计和研发、营销和策划、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等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所谓可控性即防备受制于人。

目前产业链循环断链的国外环节并非都是国内不能配套,或者不具备相应的技术供给条件的。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工业大类 39 个,中类 191 个,小类 525 个。当年外商直接投资纷纷涌入中国,就是看准中国有完整的供应链。这种完整的供应链能够支撑中国转向国民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当然,需要相应的供应链环节创新出能够替代国外环节的关键核心技术。

产业链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是在疏通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中重组供应链和产业链:一方面要使中断的国际产业链环节能够在国内找到替代,另一方面失去国外订单的供应商变成推销商,在国内找到新的买家。在此基础上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体系的整体适配性。针对产业链上可能遭到封杀、断供的环节,在可能“一剑封喉”的产业链环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可控性。这是现阶段产业链转向内循环的着力点。具体地说,涉及两个方向:

一是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在国外的关键技术环节转向国内。现代的国际竞争表现为全球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虽然是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为主导,但并不是每个环节都拥有关键技术。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布局在国外的产业链环节,不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导向,而是高端技术导向。就是说,进入其产业链环节零部件供应商必须是世界级高科技企业,就像华为智能手机的照相系统用的是德国的莱卡,芯片用的是美国高通的高端芯片。否则该产业链就没有国际竞争力。现在被断供的环节转向国内同样要求相应供应环节的高端科技水平,进入产业链的零部件的国内供应商也应该达到世界级的高科技水平,否则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还是没有国际竞争力。

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我国大部分产业和企业原先的全球价值链中主要处于装配、加工等低端环节,拥有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中高端环节布局在国外。在低端环节上,附加值低、受制于人,且随着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上涨,中低端环节已经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一方面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企业对我国处于中低端环节的企业断供中间品,另一方面布局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中低端环节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分流,由此中国企业参与的已有的全球价值链实际上已经断链。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积极选择是在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基础上重组产业链。其现实基础是,我国的大部分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产业和企业经过多年为中高端环节配套的实践有条件边干边学,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从而在关键零部件,如汽车、飞机的发动机、半导体的芯片、手机的智能系统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自主品牌的产业。在此基础上,我国产业可能迈向中高端甚至形成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现代化。

(二)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产业链循环转向内循环的瓶颈是我国产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准,需要替代外循环的环节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7],这意味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的堵点在相关环节的技术供给不足。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制造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在11个先进制造业领域中,共有287项核心零部件、268项关键基础原材料、81项先进基础工艺、46项行业技术基础领域有待技术突破。大量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关键材料、高端检测设备严重依赖进口,2019年进口芯片3055亿美元。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解决与产业链需求相适配的“技术供给”,改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现状。其路径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产业链转向内循环,近期突出需要解决产业链外循环受到打击和断供的环节转向国内循环。这些环节的技术都是高端的,相当部分是国内技术供给的短板。这些“卡脖子”技术环节的国内替代就需要创新攻关。如果不能突破,产业链的内循环就不可能顺畅,新发展格局就难以形成。根据产业链现代化要求,不只是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时的技术(跟跑),而是要同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超前(领跑)。就是说,产业链环节转向国内不仅仅是寻求替代,而是要求替代的技术更高,质量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8]。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意味着新发展格局中的产业链循环的技术和产业创新必须得到自立自强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支撑。现在所关注的新产业革命是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代表,产业革命的直接基础是科技革命。

现阶段的技术创新已经上升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主体由工程师转变为科学家。其主要说明是:创新阶段上延到发现新技术的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阶段;科学发现与生产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之间的时间缩短,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新技术由最新的科学发现的成果迅速转化而来,为实现大的技术跨越提供可能。显然,围绕产业链部署的创新链,需要基础研究引领。基础研究则需要原始创新以创新核心关键技术为导向。在此基础上畅通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

因此,服从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需要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当前我国原始创新成果少、存在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领域的供给激励不足,一方面基础研究不仅在于其投入少,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基础研究不是以创新核心关键技术为导向;另一方面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技术新产业的通道不畅。这同时也表明,畅通国民经济内循环包括畅通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通道。实践证明,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协同创新的平台上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有效路径。

三、外循环: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发展无论是对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9]。新发展格局绝对不是封闭起来进行自我的、国内的经济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同时要使国

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互动起来,以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更好吸引、优化、重新配置全球资源与要素,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全面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相应地,我国的开放战略需要调整,以适应新发展格局要求。

(一)参与国际分工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意味着原有资源禀赋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终结。习近平在 2016 年第十六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所谓新的比较优势,也就是竞争优势。它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而是在创新驱动基础上所产生的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10] 竞争优势理论就是把创新和技术进步列为思考的重点,这种新优势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品牌、服务和质量。其中尤其要重视两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核心技术的优势,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另一个是产业优势,就如波特所说竞争优势理论的依据:“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11]。谋求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是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能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这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也是参与外循环的支撑。

(二)开放发展由出口导向转向创新导向

出口导向的开放模式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扩大利用外资”或“出口创汇→扩大进口→发展生产→扩大出口”的链条,这种模式忽略了培育国内市场大循环体系。新发展格局所需要的开放发展,突出的是围绕自身发展需要参与利用国际市场、有效配置国际资源。目标在于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开放中提升质量和效益。在新发展格局中,外循环的着力点是发展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是占领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世界制高点。

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主要特征是以高质量的“进”促高水平的“出”,有效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首先是扩大“进”,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借助进博会等平台扩大进口,尤其关注国内循环中遇到的技术供给堵点环节的产品和技术进口。其次是升级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注重外资质量。与过去一般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国内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制造环节的外商投资不同,引进外资要以其科技水准进行选择:外资进入的环节应该主要集中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外资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国际领先的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的“出”则是出口替代,提高出口质量,包括以出口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以科技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服从于产业链现代化要求,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着力引进创新资源。首先是突出高端人才的引进。过去着力引进资本要素,原因是其他国际资源包括技术和管理要素是被资本带进来的。创新导向则着力引进高端创新人才。原因是国际创新要素(包括高端科技和管理要素)是跟着人才走的。这些人才进入我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研发平台和科技企业,可以引领科技创新和创业。其次是依靠开放式创新强化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创新导向的开放发展把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推向了开放发展的前台。自立自强不等于封闭创新,更需要开放式创新。科研部门可以通过开放性实验室、开放式研究平台吸引和引进国际科学家参与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不仅瞄准产业链上的“卡脖子”技术,而且瞄准国际前沿技术,以最新的原创性科技引领国际国内双循环。

(三)重组产业链国际布局

新发展格局不排斥产业链的国际布局,这是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尽管某些发达国家针对我国产业链的一些环节进行断供,但不可能完全堵塞外循环的通道。在产业链布局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国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新通道,其中就有“一带一路”的通道。

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可以以全球价值链的思路走出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2]走出去的产业链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布局;二是我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上迈向中高端环节的同时将低端环节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延伸布局。显然,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在“一带一路”上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重要平台。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 [1]阿玛蒂亚·森.学会如何学[J].社会科学战线,2020,(8):278-280.
- [2]斯慕格里茨.中国第三代改革的构想[M].中国走向(胡鞍钢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51.
- [3]洪银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N].学习时报,2020-12-18.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5-226.
- [5]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824).https://www.ccps.gov.cn/xsxxk/zyls/202008/t20200825_142912.shtml.
- [6]洪银兴.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N].光明日报(理论版),2020-10-20.
-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3.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9.
- [9]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五论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8-04-15.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5.
- [11]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6:30、37.
- [12]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8072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7/26/c_1123177214.htm.

(收稿日期:2021—01—25 责任编辑:赵爱清)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ong Yin-xing, Yang Yu-zhen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Xi Jin-ping's new socialist ideology and China'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ept of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been formed,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practice needs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aths to transfer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first path is demand-side promotion, cultivating a complete domestic demand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basic role of consumption links, and pointing out that the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links have a supporting and market realization role for consumption demand. The second path is supply-side promotio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innovation chain should be deeply integrate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e innovation chain should be deployed around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third path is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turn,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 oriented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org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layou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ouble Circul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Path